朐山、彌河得名新考

（首發）

孟繁璞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山東省臨朐縣北有朐山，另有發源於縣南，北向流經青州市、壽光市等地的彌河。歷代對朐山、彌河名謂的認識尚無定論，本文擬就此問題試做探討。

一

對於朐山名謂的解讀，嘉靖《臨朐縣志·風土志》可為代表，認為山“近瀰水，自一面望之加<如>朐。”[[1]](#endnote-1)本地文史學者認為此朐通軥，指的是“車軛兩邊叉馬頸的曲木”[[2]](#endnote-2)，即依形命名。《臨朐縣地名志》亦持此論[[3]](#endnote-3)。據考，秦臨淄郡已置臨朐縣[[4]](#endnote-4)，西漢在這一帶先後置有臨朐侯國、臨朐縣，据此推测，朐之名義與是地構成關聯應早在秦代之前。至於彌河[[5]](#endnote-5)，其在歷史上有洋水、巨洋水等多種稱呼。《水經注》“巨洋水”條載：

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眛，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朐彌，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6]](#endnote-6)

此水《漢書·地理志》班固注中稱作洋水[[7]](#endnote-7)，陳橋驛先生在其著作《水經注校證》“巨洋水”條校文中列有鉅眛、具[[8]](#endnote-8)。顧炎武《山東肇域志》“臨朐縣”與“壽光縣”條下分別抄有巨彌河[[9]](#endnote-9)與渳河[[10]](#endnote-10)。清至民國臨朐、壽光的幾種縣志亦載多說，如嘉慶刊本《壽光縣志》稱：“巨洋水……亦曰朐瀰，俗名為瀰河”[[11]](#endnote-11)，又稱：“洋水即今之巨洋水也”[[12]](#endnote-12)，民國《壽光縣志》載：“《後漢書》作沫水，……《唐書》作米河。”[[13]](#endnote-13)光緒《臨朐縣志》也有所提及：“巨蔑水……今直謂之洱河。”[[14]](#endnote-14)

除巨洋水、洋水的稱呼外（二名單列緣由見下文），單就音韻而言，上述別寫存在內部的借用、自洽關係。具、巨、鉅、朐字，以及沫、眛、蔑[[15]](#endnote-15)、米、彌/瀰、弭/洱/渳諸字顯示二者分別指向某讀。尤其在彌河別名之中所夾雜出現的朐字，更是隱約提示了朐山之名與彌河或有所關涉。下文即以巨洋水為線索，試作論說。

依《水經注》的說法，巨洋水與具水是同一條河流。對巨洋之釋義，《齊乘》可為代表：“洋為齊之大川，故以巨名。”[[16]](#endnote-16)《方言》云：“巨，大也。……齊宋之間曰巨曰碩。”[[17]](#endnote-17)《漢書·地理志》班固云：“洋水……入鉅定”[[18]](#endnote-18)，《水經注》也提到巨洋水“注於巨淀”[[19]](#endnote-19)，則是名頗顯齊地色彩。不過本文認為，此說仍有未恰之處。

《詩經·衛風·碩人》有“河水洋洋”一語，《傳》云：“洋洋，盛大也。” [[20]](#endnote-20)清人馬瑞辰按：

……劉向《九歎》：“江湘油油”，王逸《注》引《詩》“河水油油”，即此詩“洋洋”之異文。油、洋一聲之轉。洋洋通作油油，猶蠅蠅通作油油也。（小字：古蠅聲近洋）。《方言》：“蠅，東齊謂羊。”《尚書大傳》“禾黎之蠅蠅”，《文選》引作“禾黎油油。”[[21]](#endnote-21)

以洋洋來形容水盛，固無不可。另據同書《邶風·新臺》有“河水瀰瀰”之文，《傳》云：“瀰瀰，盛貌” [[22]](#endnote-22)。《漢書·地理志》則引作“河水洋洋”[[23]](#endnote-23)。馬氏按云：

……（瀰瀰，）古本原作濔濔。……瀰瀰又作，《玉篇》：“，亦瀰字。”《廣韻》：“瀰，或作。”《漢書·地理志》引《詩》“河水洋洋”正形近之訛，即瀰瀰之異文。[[24]](#endnote-24)

《碩人》“洋洋，盛大也”與《新臺》之《傳》的“瀰瀰，盛貌”在含義上明顯接近。如此來看，洋洋不純是瀰瀰之訛。故而對巨洋之釋義（巨雖可訓大，但亦有通作朐的可能。相關問題後文另行探討），遂出現了兩種釋讀方向：一則巨洋水不誤，一則即巨瀰水。

對於此問題，楊守敬在《水經注疏》“巨洋水”條下提及一處重要異文。其引盧文弨、《玉篇》《集韻》以及桂馥之說，亦判洋為誤字，但結論是當作[[25]](#endnote-25)。此字於文中雖多次出現，但筆者所參抄本字跡漫漶，似是，也可能是。《楊守敬集》所收《水經注疏》排作[[26]](#endnote-26)，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水經注疏》則印為字[[27]](#endnote-27)。此字形的出現可以說為進一步確認朐、彌之關聯，以及巨洋名義提供了新的線索，不過對其終始之尋繹需將目光投向西方。

二

古時華夏族裔對今之新疆地區形成系統認識肇始於西漢武帝時期，相關記載首見於《史記》。其中《大宛列傳》收錄有一個名為扜罙的綠洲王國[[28]](#endnote-28)：

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29]](#endnote-29)

《史記集解》：

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窴三百里。”

《史記索隱》：

扜冞，國名也，音汙彌二音。……拘音俱，彌即冞也，則拘彌與扜冞是一也。[[30]](#endnote-30)

扜罙二字，本傳與《集解》《索引》用字既殊。《漢書·西域傳》則作扜彌[[31]](#endnote-31)，《後漢書·西域傳》作拘彌[[32]](#endnote-32)，《魏略·西戎傳》作扞彌（《三國志》裴注）[[33]](#endnote-33)，《水經注》作扜彌[[34]](#endnote-34)。薛宗正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二字亦作扜鰛[[35]](#endnote-35)。今多作扜彌。

關於定名問題，前之扜字在《漢書·西域傳》中師古注為“扜音烏”[[36]](#endnote-36)，與《索引》實同。另據楊寶忠先生考釋，扜有“於娱、口孤二切”，並將今音定為wū、kū。[[37]](#endnote-37) 至於扜、朐字的關聯情況，單就音韻而言，二字旁紐雙聲、旁轉疊韻，不過目前僅能發現一條間接通假用例。《莊子·天運》：“吹呴呼吸”，《藝文類聚》引文呴字作吁。[[38]](#endnote-38)另外，張家山漢簡《脈書》有“氣者朐（呴）殹（也）”[[39]](#endnote-39)，是為呴、朐的通假用例。這些應可旁證扜與朐的相關性。

後一字則涉及對《水經注疏》漫漶字（或）的討論。檢索國學大師網站列出的羊字異體，其中有、（《五經文字》），以及、、（《佩觽》）等相同或相近的字形。對照可知，所謂字實當刊作，其右上部不是偏旁艸，而是字的右上部構件。《說文》：“𦫳，羊角也。象形”，可為旁證[[40]](#endnote-40)。至於罙與冞，《詩經·殷武》“罙入其阻”，《說文》引文罙作䍘。[[41]](#endnote-41)䍘又與彌通，《廣雅·釋詁三》“䍘，深也”王念孫疏證：“䍘，與彌通。”[[42]](#endnote-42)是罙、冞等與羋、羊可構成關聯。

如果上述對冞、羋、羊諸字的關聯性判斷可信，那麼可以證明儘管巨洋水可如馬氏按語所提示的那樣識作巨洋水，但仍無法排除當識作巨瀰水的可能。進一步梳理，在扜彌的字形之中，前一字甚至出現寫作扞、汗的情況。例如，順治十一年補輯重鐫本《史記》之中，扜罙刊作扞冞[[43]](#endnote-43)。《西域圖志》也提出：“古扜彌國……《唐書》稱汗彌。……而自扜至汗，音釋遞變，然唐平高昌都部（原文括語：都部疑為諸部之誤），曾至葱嶺以南。較之漢時之僅僅通使者，稱名較爲親切，當自以汗彌為正。”[[44]](#endnote-44)從字形角度推測，當“前字”在寫作扞或汗之時，實有兼顧“後字”、洋的考慮（儘管這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審音混亂）。這可以說明扞、汗等不純是扜、汙訛字。如此來說，洋、字另有一種指向：巨洋水之洋實有扜字“意味”。如此，又出現了識作巨朐水的可能。

以上圍繞巨洋水的探討，仍是在認定巨訓大的前提下而作的歸納。如果把巨、朐通假的情況也考慮在內，那麼對巨洋水名謂的推測順勢形成四種可能：前三種巨皆訓大，一為巨洋水不誤，洋取盛大義。一為與巨朐水同，一為與巨瀰水或巨洋水同（儘管今音瀰、洋有別，此仍作並列處理，下同）。第四種則是巨洋水當徑讀作朐瀰水（未見到與朐瀰水同義的朐洋水之稱，故不列出）。至於洋取盛大義而作朐洋水的情形頗不合命名習慣（當作洋朐水方是），故不列入。

本文認為，上述的四種推測雖難驟斷取捨，但應有層次之別。以下分兩種情況試作說明。

第一種情況，扜彌二字不可分言。聯繫日語中漢字梅、馬分別讀為ウメ（u me）、ウマ（u ma），字頭的ウ（u）是出於擬音準確的考慮而作的保留，推測上古漢語存在類似的語音現象。既然《漢書·西域傳》已有“扜音烏”的說法，則扜或朐似乎只是口型標示字，由是所謂扜冞實即冞。而冞又與羋相涉，《說文》：“羋，羊鳴也”，或為旁證。故而就層次論，“羊鳴也”當為原始義，水盛說（洋洋、瀰瀰）雖未可云誤，然應視作同時（層次意義上的）或後起關聯義。至於巨訓大之論則又是在兼顧語音、水盛說、融入齊地色彩數種考量之上的演化了。[[45]](#endnote-45)

第二種情況，從西域地區的族群交通視角來考察，西漢初期西域有樓蘭（漢昭帝元鳳四年更名鄯善）國，王城扜泥城。余太山先生認為，扜泥即佉盧文的Khuhani[[46]](#endnote-46)，還可以寫作Kuvani、[[47]](#endnote-47)（拉丁文轉寫，下同），其可與驩泥（xuan-hyai）、扞泥（kan-hyai）同論[[48]](#endnote-48)，並支持日本學者榎一雄的觀點，乃京都之義[[49]](#endnote-49)。除此之外，余先生還提到：“小宛國王治城扜零城，扜零（a-lyeng）與扜泥當為同名異譯。”[[50]](#endnote-50)至於扜彌國，“且末、杅（扜）彌[[51]](#endnote-51)、姑墨、且彌不妨視作同名異譯，或皆出一源。”[[52]](#endnote-52)並猜測這些王國可能是由進入塔裏木盆地的塞種人之中的Comari或Comedie人所建。[[53]](#endnote-53) 如此來看，扜彌即便不是京都之義，多半也承載著某項通名語義。只是出於區別一眾“同名”王國的需要（還應包括余先生未列出的渠犁國），由是在語音或“拼寫”上做了差異化標識。[[54]](#endnote-54)

另據林梅村先生研究，“伊犁河流域是斯基泰人（筆者按：塞種人別譯）的原始故鄉，在大月氏人打擊下，他們被迫離開故鄉。其中一隻南遷印度河流域’”，“另一部分斯基泰人南下塔裏木盆地西部。遷入塔裏木盆地的斯基泰人逐漸從遊牧人演變成農業定居民族”，“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的疏勒、于闐、扜彌王國，皆為斯基泰人建立的綠洲王國。”[[55]](#endnote-55)同樣將扜彌國的建立指向了塞種人。林先生還提出：“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興起的月氏人、塔裏木盆地北部的龜茲人、焉耆人、塔裏木盆地東部的樓蘭人，皆為吐火羅系統民族。”結合余先生在《關於鄯善國王治的位置》一文中提出的論斷，則鄯善人雖講吐火羅語，但使用佉盧文書寫。目前問題在於，“新疆出土吐火羅語寫卷表明，吐火羅人講印歐語系的語言。儘管他們居住在印歐語系東方語支（Satem）分佈區，但是吐火羅語卻具有印歐語系西方語支（Centum）許多特點。”[[56]](#endnote-56)塞種人使用的語言“屬於印歐語係的東伊朗語支”[[57]](#endnote-57)，即上文提到的“印歐語系東方語支”，則鄯善人與扜彌人雖同為印歐人，但使用不同語支的語言。尤為複雜的是，目前“藉助現代語言學的成就和手段研究西域歷史和文化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應看到，對於探討南北朝以前西域的人種和語言收效不大。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保留至今可供語言學分析的資料太少。二是不能排除一種語言引進另一種語言詞匯（彙）的可能性。一些專門名詞往往被同時或後世操不同語言的部族使用。在一些國家中，還同時流行兩種以上語言和文字。”[[58]](#endnote-58)儘管樓蘭王城（扜泥）與扜彌在名謂上很可能存在某種關聯，但既然印歐人使用的語言不止吐火羅語一種，這遂無助於說明作為塞種的扜彌國人究竟使用何種語言。如果從地理位置判斷，樓蘭旁鄰婼羌[[59]](#endnote-59)，扜泥、扜彌甚至不排除源於古羌語（當然也存在相反的可能。不過從婼羌的名義看，這種可能要小得多）[[60]](#endnote-60)。如此來說，對扜彌名謂的判斷，即便寬泛地視作印歐語詞仍有風險，故本文僅以非雅言論之。[[61]](#endnote-61)

最後，從族群遷徙的視角來看。假若前論不誤，那麼本文所嘗試說明的僅是先秦時期中國境內族群遷徙的一個事例罷了。考慮到至遲西漢中期，塔裏木盆地周邊已有婼羌、戎盧等國，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其中的不少部族早於西漢之時已出於各種原因數度向東方遷徙。例如，代戎之與岱山[[62]](#endnote-62)，允姓之戎之與沇水、兗州，北齊[[63]](#endnote-63)、逢/逄、紀、州、㠱、向等眾多姜姓國的出現，白狼山、白狼水之與山東中部的白狼山、白狼水，再如渠丘等等，彼此應存在關聯。至於勾檷之山（《山海經·中山經》）[[64]](#endnote-64)、見於西周初年器物上的“”地[[65]](#endnote-65)、秦漢東海郡的朐山和朐縣，很可能同為扜彌族人東徙留下的印跡[[66]](#endnote-66)。

1. 不題撰人：《嘉靖臨朐縣志》[M]，一九六二年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影印，上海書店，1982年，第8頁。 [↑](#endnote-ref-1)
2. 譚家昌：《朐山》，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臨朐縣委員會編：《（臨朐縣）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Z]，1988年，第181、191頁。相關研究可參 王金剛：《臨朐縣名淺探》，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臨朐縣委員會編：《（臨朐縣）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Z]，1987年，第137-141頁。 [↑](#endnote-ref-2)
3. 臨朐縣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編：《臨朐縣地名志》[M]，1995年，第368頁。 [↑](#endnote-ref-3)
4.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87頁。 [↑](#endnote-ref-4)
5. 為區別一般性敘述（含今名）與考釋，以下分別以彌、瀰為準。僅個別情況不依此例。 [↑](#endnote-ref-5)
6.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卷二十六，《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92頁。 [↑](#endnote-ref-6)
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漢書》（第六册）[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583頁。 [↑](#endnote-ref-7)
8. [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卷二十六，《水經注校證》[M]，第611頁。 [↑](#endnote-ref-8)
9. 顧炎武撰：《山東肇域志》，收於顧炎武撰，譚其驤、王文楚、朱惠榮等點校：《肇域志》（第六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03頁。 [↑](#endnote-ref-9)
10. 同前書，第4301頁。 [↑](#endnote-ref-10)
11. [清]劉翰周等纂修：《壽光縣志》卷二《輿地志二》[M]，清嘉慶五年刊本，第1頁。 [↑](#endnote-ref-11)
12. 同前書，第2頁。 [↑](#endnote-ref-12)
13. [民國]宋憲章等修，鄒允中等纂：《壽光縣志》卷二《輿地志》，《山東省壽光縣志》（第一冊）[M]，據民國二十五年鉛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39頁。 [↑](#endnote-ref-13)
14. [清]姚延福修，鄧嘉緝等纂：《光緒臨朐縣志》卷三《山水下》，《山東省光緒臨朐縣志》（第一冊）[M]，清光緒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89-90頁。 [↑](#endnote-ref-14)
15. 為蔑的一種固定訛化寫法，又作薎。《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一處薎字用例。郝懿行案：“薎當為蔑字之訛”（郭璞注，郝懿行箋疏：《山海經》[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71頁）。今從之。由於其與正文以音韻推求不屬一類，故於此單獨說明。 [↑](#endnote-ref-15)
16. [元]于欽撰，劉敦願、宋百川、劉伯勤校釋：《齊乘》卷二，《齊乘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18頁。 [↑](#endnote-ref-16)
17. 華學誠匯證，王智群、謝榮娥、王彩琴協編：《方言》卷一，《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7頁。 [↑](#endnote-ref-17)
18. [漢]班固撰：《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漢書》（第六册）[M]，第1583頁。 [↑](#endnote-ref-18)
19. [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卷二十六，《水經注校證》[M]，第594頁。 [↑](#endnote-ref-19)
20.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李傳書、胡漸逵、肖永明、夏先培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66頁。 [↑](#endnote-ref-20)
21. 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08頁。 [↑](#endnote-ref-21)
22. [漢]毛亨傳：《毛詩正義》[M]，第208頁。 [↑](#endnote-ref-22)
23. [漢]班固撰：《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漢書》（第六册）[M]，第1647頁。 [↑](#endnote-ref-23)
24. 馬瑞辰撰：《毛詩傳箋通釋》（第一冊）[M]，第158頁。 [↑](#endnote-ref-24)
25. [清]楊守敬、熊會貞同撰：《水經注疏》卷二十六[M]，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森鹿三钞本，第10-11頁。 [↑](#endnote-ref-25)
26. 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四冊）[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598頁。 [↑](#endnote-ref-26)
27. [後魏]酈道元注，[清末]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02-2203頁。 [↑](#endnote-ref-27)
28. 兩漢時期，扜彌（王城扜彌城，后更名寧彌城）和于闐是今新疆塔克拉瑪干以南地区最大的兩個國家。其中，前者位於今和田地區策勒縣境內。相關研究詳見：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收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47-151頁；殷晴：《漢代于闐的崛起與興盛》[J]，朱玉麟主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99-220頁；曲英傑著：《水經注城邑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2-38頁；田衛疆、依第利斯·阿不都熱蘇勒主編：《絲綢之路 西域通史》[M]，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15年，第39頁。 [↑](#endnote-ref-28)
29.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史記》（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808頁。 [↑](#endnote-ref-29)
30. 同前書，第3809頁。 [↑](#endnote-ref-30)
31. [漢]班固撰：《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上》，《漢書》（第十二册）[M]，第3880頁。 [↑](#endnote-ref-31)
32.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後漢書》（第十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915頁。 [↑](#endnote-ref-32)
33.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三國志》（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16頁。 [↑](#endnote-ref-33)
34. [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卷二，《水經注校證》[M]，第34頁。 [↑](#endnote-ref-34)
35. 薛宗正著：《古代于闐與佛法初傳》，收於《西域史匯考》[M]，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37頁。 [↑](#endnote-ref-35)
36. [漢]班固撰：《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上》，《漢書》（第十二册）[M]，第3880頁。 [↑](#endnote-ref-36)
37. 楊寶忠著：《疑難字三考》（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15頁。 [↑](#endnote-ref-37)
38. 轉引自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M]，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第338頁。 [↑](#endnote-ref-38)
39. 轉引自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8頁。 [↑](#endnote-ref-39)
40. 相關字形辨析詳參 楊寶忠著：《疑難字三考》（全二冊）[M]，第61、433-434頁。 [↑](#endnote-ref-40)
41. 轉引自 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M]，第242頁。 [↑](#endnote-ref-41)
42. 轉引自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95頁。 [↑](#endnote-ref-42)
43. 轉自 國學大師網站（2019年5月22日檢索）：<http://www.guoxuemi.com/gjzx/716768pnin/64432/>。 同書第16冊，第2頁。 [↑](#endnote-ref-43)
44. 《新疆文庫》編委會編，鍾興麒等校注：《西域圖志》卷十九《疆域》，《西域圖志校注》[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99頁。 [↑](#endnote-ref-44)
45. 本文開頭提出，今臨朐縣一帶“朐之名義與是地構成關聯應早在秦代之前”，此處之所以不稱朐山，是考慮到自《水經注》提出“臨朐山名也，因縣氏之”的說法之後，歷代多持此論（《太平寰宇記》《齊乘》等）。但明末傅國在其私修臨朐地方志《昌國艅艎》中提出：“歷稽輿圖，未有以山名臨者”，認定臨朐之名謂“必從臨水名也”，甚至已經猜到“疑具、朐音近”這一關鍵（轉自前引 王金剛：《臨朐縣名淺探》，收於《（臨朐縣）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Z]，第138-140頁）。伴隨晚近面世的大量出土文獻所提供的新證據，地名之中臨字的使用是否僅就河川而言，還有進一步核驗的餘地。若僅從本文結論出發，朐山儘管同樣包涵朐彌山之義，但依照臨字的一般用法，臨朐（縣、侯國）名謂所表達的終究是臨即朐瀰水之義。 [↑](#endnote-ref-45)
46. 余太山著：《關於鄯善國王治的位置》，收於《塞種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10頁。 [↑](#endnote-ref-46)
47. 林梅村著：《沙海古卷：中國所出佉盧文書（初集）》附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36頁。 [↑](#endnote-ref-47)
48. 余太山著：《關於鄯善國王治的位置》，收於《塞種史研究》[M]，第309頁。 [↑](#endnote-ref-48)
49. 榎一雄：《鄯善の都城の位置とその移動について（就鄯善都城之位置及其遷移所作的研究）》[J]，《オリエント（東方）》8-1（1965年），第1-14頁；8-2（1966年）第1-12頁。轉引自 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收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M]，第145頁。 [↑](#endnote-ref-49)
50. 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收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M]，第145頁。 [↑](#endnote-ref-50)
51. 扜彌，佉盧文作Kheme、（林梅村著：《沙海古卷：中國所出佉盧文書（初集）》附錄[M]，第636頁）。 [↑](#endnote-ref-51)
52. 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收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M]，第147-148頁。 [↑](#endnote-ref-52)
53. 同前書，第148頁。 [↑](#endnote-ref-53)
54. 由於無法看到榎先生原文，日文中本字的用法推測與此處京都義考釋之達成屬於相同的思路。在漢語之中，本、根互訓（《莊子》內篇即云：“自本自根”）。本字主要用來解釋和描述事物的深層原由，引申有此處的、腳下的、在此附近之義。日語氏名如坂本、本田、松本等同樣依緣該義而來。但不同之處在於，日文隱含強調了主語，且有自明方位的效果。所以，上述用例準確意味為：在那個山坡不遠處的我家，那块田旁邊的我家，那棵松樹旁邊的我家。猜測扜彌、扜泥、扜零等應有大聚落這層含義。這既可以解釋它們之間的為何存在“同名”關係，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明瀰瀰、洋洋的水盛義由來。 [↑](#endnote-ref-54)
55. 林梅村著：《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7、188頁。 [↑](#endnote-ref-55)
56. 同前書，第13頁。 [↑](#endnote-ref-56)
57. 王炳華著：《塞人事跡鉤沉》，收於《西域考古文存》[M]，蘭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2頁。 [↑](#endnote-ref-57)
58. 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種和語言、文字》，收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下冊）[M]，第423頁。 [↑](#endnote-ref-58)
59. 對婼羌與羌人關係的研究詳參 前書，第418頁；黃文弼著：《漢西域諸國之分佈及種族問題》，收於黃文弼著，黃烈編：《西域史地考古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92-193頁。 [↑](#endnote-ref-59)
60. 考古顯示，塔裏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銅文化即為吐火羅文化與中國西部土著文化羌文化結合的產物（詳參 林梅村著：《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M]，第14、28-29頁），這正體現出兩種文化存在交融的一面。 [↑](#endnote-ref-60)
61. 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試圖論證的朐彌名謂與扜彌相涉是基於扜彌國以扜彌為號這一事實。至於扜彌與扜泥、扜零等的關係更應看作是這一詞彙的時代性特征，又或是對其語源背景的反映。 [↑](#endnote-ref-61)
62. 最早提出太山源名岱山的可能是張肇麟先生。詳參 氏著：《夏商周起源考證》[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266-267頁。 [↑](#endnote-ref-62)
63.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最終修訂版）[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357頁。 [↑](#endnote-ref-63)
64. 同前書，第148頁。 [↑](#endnote-ref-64)
65. 李步青、林仙庭：《山東龍口市出土西周銅鼎》[J]，《文物》，1991年第5期，第84-85頁。轉引自 王輝編著：《古文字通假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34頁。 [↑](#endnote-ref-65)
66. 吳良寶先生在《談戰國時期齊國的置縣問題》一文中提到，施謝捷先生在當時尚未發表的齊國兵器銘文裏發現有一地名為句莫，且明確與姑幕不為一處（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C]，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第185頁），則不排除句莫即朐彌的另一種寫法。與之相關，暫時亦無法判斷其是否為秦漢臨朐縣前身。 [↑](#endnote-ref-66)